

菲利普·罗斯大屠杀书写的语境与特征

苏鑫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临沂, 276005)

摘要: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揭示了大屠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到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文章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 探讨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 旨在说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一方面拓展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展现了当代犹太人身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 犹太民族; 大屠杀书写; 悖谬性; 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5-0198-06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曾说:“我认为, 对于绝大多数思考的美国犹太人来说, 它(大屠杀)就在那里, 时而隐藏, 时而淹没, 时而显露, 时而消失, 但是却不能忘记。你不能利用它, 而它却可以利用你。”^{[1](136)}从中可见罗斯认为犹太民族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大屠杀是不能被遗忘的, 并且切实影响到远在美国的犹太人的生活, 但同时大屠杀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又是一种有距离的存在, 美国犹太人无法直接描述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 因此大屠杀与美国生活之间又是割裂的。罗斯在《再见, 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1983)、《布拉格狂欢》(*The Prague Orgy*, 1985)、《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1986)、《遗产》(*Patrimony: A True Story*, 1991)、《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1993)等众多作品中都有大屠杀书写, 并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外很多学者都认识到罗斯大屠杀书写的重要性, 如米勒维茨(Milowitz)指出, 一直以来对罗斯的研究都忽视了大屠杀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性, 认为对罗斯所有作品的解读, 如果忽视大屠杀事件这一催化剂, 则不能正确找到罗斯在美国思想中的地位^{[2](ix)}; 但也有学者对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提出了质疑, 认为罗斯的大屠杀书写剔除了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苦难经历, 使灾难性的经历普遍化, 消除了它原应承载的沉重历史命题^{[3](80)}。这两方面的认识显然都注意到了罗斯大屠杀书写的重要地位, 但是夸大甚至

误读了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用意和目的, 掩盖了罗斯在处理大屠杀事件时所体现出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本文尝试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色情化以及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展现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

一、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罗斯的大屠杀书写, 我们应该将罗斯置放于更加广阔的二战后大屠杀美国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共性和特殊性, 一方面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暗合了大屠杀进入美国主流话语的过程, 另一方面两者各自的发展方向又是不同的。

首先, 罗斯个人的生活和创作以一种神奇、巧合的方式迎合了大屠杀事件叙述在美国并进入主流文化的过程。罗斯出生于1933年, 这一年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大权; 罗斯在19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再见, 哥伦布》, 在书中罗斯探讨了二战后美国社会中犹太人对欧洲大屠杀的微妙心理, 而这一年恰好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大屠杀态度从沉默失声到公开讨论的转折点, 标志性事件是大屠杀受害者日记《安妮日记》被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了电影并发行。两年后的1961年, 以色列逮捕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并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

收稿日期: 2014-05-10; 修回日期: 2014-08-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项目“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身份探寻与历史书写”(12CWW038)

作者简介: 苏鑫(1980—), 女, 山东德州人, 临沂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犹太小说

了公开审判，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判处了艾希曼死刑，这次审判开启了大屠杀研究的划时代转变。1978年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电影制作人杰拉德·格林(Gerald Green)创作的小说(原著小说曾列为一九七八年平装本小说畅销书之一)改编的长达7小时的电视影集《大屠杀》播出，该剧的播出加快了大屠杀讨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文化的速度。1979年罗斯发表了《鬼作家》，作品中对《安妮日记》进行了改编。之后罗斯又在1993年发表了主要书写大屠杀的作品《夏洛克行动》，而这一年反映大屠杀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并获得空前的成功，位于华盛顿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于当年落成，这一年被美国的ABC新闻命名为“犹太大屠杀年”。罗斯与大屠杀记忆事件的平行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社会和人文语境。

其次，两者的发展方向却是不同的。大屠杀的美国化具有普适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当代犹太哲学家、思想家法肯海姆(Fackenheim)指出，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生存遭遇到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主要的矛盾之一就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矛盾”^{[4](712)}。美国主流话语对大屠杀建构过程中有普遍主义的视野，似乎有意淡化大屠杀的犹太民族特性、并导向至高无上的普遍人性。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大屠杀话语大有行销世界的趋势，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大屠杀电影、电视剧、纪念馆的含义，超越了犹太民族的特殊经历的局限性和其独特的话语背景，因此大屠杀成为人类苦难与救赎的一个普适性隐喻。同时，大屠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绝望性、恐怖性也被美国的国家视角所替代、消解，也就是“净化”处理(sanitization)，更加突出了美国梦所具有的“希望、牺牲、正义、未来”等积极的理念，成为美国社会独特的凝聚各个阶层、民族的策略^[5]。但有学者指出：“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事件，赋予大屠杀越多的意义，那么距离美国犹太人的生活就越来远。”^{[6](53)}有关大屠杀的叙述在道德上坚不可摧并且不容置疑，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成为被保护的对象，他们在受难者身份和美国身份的庇护下，拥有了无法比拟的“道德资本”，貌似比其他的少数民族较早、较成功地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在获得优越性的同时，也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切掩盖了美国犹太人在面对历史创伤时复杂的心态，正如诺维克(Novick)所说：“受难文化并未导致犹太人接受一种建立在大屠杀基础上的受难者身份；只是容许这种身份占居优势……这些人不确定的犹太身份使他们在犹太生存问题上产生了太多焦虑。”^{[7](190)}因此，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以不同的表现方

式把大屠杀拉回到犹太人身上，强调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身份的具体影响，也就是大屠杀的特殊性。罗斯以更加自由、叛逆的姿态审视美国犹太人的生活，通过塑造叛逆性和颠覆性的犹太形象推进犹太民族对自我的认知。例如在《鬼作家》中，犹太青年作家祖克曼因为创作了一部反映美国犹太家庭堕落的小说而被家庭和犹太社区指责，是个犹太浪子，但是他渴望被犹太家庭和社区重新接纳，于是去探访老一代犹太作家洛诺夫寻求帮助，但却发现年老的洛诺夫自己也是困境重重，他与自己的学生爱美陷入了不伦之恋，重要的是这位学生爱美竟然是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本名安妮。祖克曼希望自己能够娶安妮为妻，这样他就能既被美国主流的群体所接受，又能够回归犹太家庭。作品中完全颠覆了安妮的形象，从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变为家庭和睦的破坏者，从神坛上被祭拜缅怀的纯洁圣女变成了有血肉欲望的凡夫俗子，这种颠覆性的改写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不仅仅是后现代的戏仿，更重要的是彰显美国主流文化所压抑掩盖的大屠杀对于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性的认知。

二、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

罗斯早期创作强调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与美国当下生活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过分地拉近彼此的亲近关系，这形成了罗斯最初对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核心。这种悖谬性特征展现了这个世界不是一体的，而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即使是同一民族的犹太人，他们之间也经历了从地理到文化上的断裂。罗斯的这种认识与当时大部分大屠杀研究者讨论的奥斯维辛之前和之后生活的剧变有所不同，他聚焦在犹太民族自身的角度去讨论欧洲和美国生活的分裂。

《狂热者艾利》清晰地展现了罗斯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一方面大屠杀的创伤已经开始进入美国社会，例如二战后美国社会接纳的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在内的大量犹太移民；但另一方面美国当地的犹太人对这些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却是含混不清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当时美国犹太人正积极地投入到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中，艾利作为犹太居民就生活在纽约的郊区，忽然有一天他和妻子安静的生活被一群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犹太孤儿和两个正统犹太人打破了，他们在艾利所在的社区里设立了犹太小学。艾利作为律师曾有过精神崩溃的历史，他被社区派去解决大屠杀幸存者和当地美国犹太居民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这些大屠杀幸存者穿着哈西德教派(Hasidism)的犹太服装，突

显了犹太人的身份,这给当地还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的美国犹太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艾利试图从同化的犹太人视角劝说这些来自欧洲的犹太人遮掩他们太过突出的犹太性,不要冒犯基督徒,但是却遭到犹太小学校长斩钉截铁的拒绝:“那位先生身上穿的是他惟一拥有的衣服。”^{[8](239)}在此罗斯揭示了欧洲传统犹太人与世俗化、现代化的美国犹太人的不同:欧洲犹太人唯一的家园被大屠杀摧毁了,他们失去了家乡,来投奔美国的犹太同胞,可是他们穿的传统黑色服装却变成了大屠杀的标志,被美国犹太同胞所排挤,他们成为彻底的无家可归者;而艾利等美国犹太人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与校长所描述的家园被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不可思议的平静。孩子们何时可以像现在这般安心入眠?大人们何时可以像现在这般酒足饭饱?……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宁静与安逸——这正是文明发展了几个世纪想要追寻的方向。”^{[8](256-257)}在这种分裂中,虽然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注意到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灾难,他们一方面对同胞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更需要保卫自己在美国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他们拒绝引入危险以免破坏自己的生活。

罗斯从七十年代起的大屠杀书写明显出现了变化,大屠杀不再只是作为美国犹太人身份意识中边缘化和威胁性的外围呈现,而是开始成为美国犹太人自我意识的中心。同时,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更倾向于批判性的书写,他集中探讨一旦大屠杀令人震惊的悲剧效果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很容易掩盖美国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性、多元性。兰格(Langer)称其为“大屠杀的优先权”,他认为这种“使用或者是滥用一大屠杀糟糕的细节加强了对道德现实、族群责任或者宗教信仰的恪守承诺,这使得我们在后大屠杀世界仍恪守古老的价值观念”^{[9](7)}。《鬼作家》中罗斯把批判的中心放在了犹太社区对大屠杀的想象,主要是通过被主流媒体理想化和偶像化的安妮形象实现。祖克曼复活了死去的殉道者安妮并重写了她的日记,在这里罗斯质疑了美国犹太社区对大屠杀扭曲的接受,“小说中用夸张化戏剧化和歇斯底里的方式展现了错位的和荒诞的犹太传统文化”^{[10](213)}。罗斯改编经典作品绝不是对历史知识的不尊重,而是以此为契机加入到了美国知识分子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中去,他指出了美国少数族裔在民族创伤基础上重建个人和民族身份的方式,大屠杀的受害者安妮的日记虽然被广泛接受,但是日记本身的感伤方式却歪曲了抵抗大屠杀恐惧的准确性和重要性。罗斯在这里呈现了大屠杀书写的历史困境:一是由于大屠杀的特殊性,大屠杀书写具有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文学的书写、文学的展现能否还原大屠杀?二是无论是虚构还是有关大屠杀的回忆录,只能是在人们已经接受的基础上去复制和重复创伤,而不能赋予创伤新的含义。罗斯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我们要对过去负责任,而是过去需要对我们承担责任,需要帮助我们面对当前,祛除过去带给我们的创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面向未来富有意义的建构。”^{[10](220)}

八九十年代之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更具想象性、多样性和讽刺性,他在严肃的大屠杀书写中加入了色情化的描写,这种大胆颠覆性的书写探索了大屠杀呈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其目的是解构大屠杀在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中的核心地位。在“祖克曼三部曲”的尾声《布拉格狂欢》(1985)中作家祖克曼受人之托去布拉格寻找大屠杀遇难者的文稿,主要讲述纳粹占领下捷克犹太人的辛酸苦难,但是祖克曼来到布拉格后却被告知,这位大屠杀的遇难者根本就不是死在纳粹的枪口下的,而是死于偶然的车祸中,在纳粹占领期间,他也没有遭受任何的苦难,而是躲在朋友家的浴室里享受着香烟和妓女。在《遗产》(1991)中罗斯的父亲拜托身为作家的罗斯帮助出版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朋友沃尔特的书稿,沃尔特是他们家族中唯一生还下来的,但是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大屠杀的悲伤、惨烈,而全部都是他的性爱冒险,他和那些救了他的女人之间的做爱经历,正如沃尔特自己说:“我写不出悲剧性那么强的书。在进集中营前,战争对我来说还是很快乐的。”^{[11](141)}沃尔特的大屠杀变成了一场狂欢,而不是上个世纪最大的悲剧,这表明一方面大屠杀已经成为表现个人和历史悲剧的有力的资源,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犹太人生活的相对和平与安全,使得他们对大屠杀的书写充满了想象性,甚至可能是歪曲的表达。罗斯正是强调大屠杀的歪曲性书写的可能性,其真正目的是指向美国犹太人的身份问题,针对已经消失的大屠杀历史,在记忆和想象的重构中具有多种可能性,而犹太人自我身份的定义也因此具有了不确定性,法国当代哲学家、作家芬凯尔克劳特(Finkelkraut)的《想象犹太人》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历史转化为记忆背景下的身份建构在自我界定中存在模糊性和脆弱性。

罗斯以悖谬性的方式书写大屠杀,原因主要在于他的特殊身份——美国犹太人,生活在安全的美国,不是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者。这种身份使得罗斯在书写大屠杀事件时缺少切身的经历,同时也就没有了受害者在表述创伤记忆时的心理重负,从而能够以更加自由的姿态来审视犹太人的历史。同时,更重要的是罗

斯力图通过这一书写方式突显大屠杀在犹太民族认同和凝聚中所发挥的历史悲情和道德资本的作用，瓦解大屠杀的严肃性、神圣性，质疑大屠杀作为当代美国犹太人认知民族身份的核心地位，从而突破西方世界单纯以大屠杀来定义犹太人的思维定式。尽管罗斯也承认大屠杀是犹太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这一事件也已经内化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但是他更想表达的是在犹太民族沉重的历史文化记忆中，还有比大屠杀更为重要的内容，而当代犹太人的命运与文化身份内涵也要远远超越大屠杀的遭遇，例如《旧约》中记载的关于圣教史的记忆、两千多年的犹太大流散(diaspora)的记忆等等，这些历史记忆对当代犹太人来说或许更有意义。并且即使是大屠杀恐怕也不能仅仅着眼于德国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屠杀，纳粹主义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两千多年来排犹历史的一个极端化的表现，因此大屠杀不能替代或者遮蔽犹太民族的其他历史记忆。

三、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

有论者认为：“美国犹太小说被束缚在必败的境地：忘记过去意味着犹太身份的失落；而记住历史，则意味着你书写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小说。”^{[10](218)}罗斯似乎并没有陷入这样失败的境地，反而在对大屠杀等犹太民族历史大事件的书写上开拓出新的道路。罗斯在《夏洛克行动》(1993)中非常专注地追踪大屠杀及其影响，突破了美洲大陆的限制，以更宽广的视野关注世界。罗斯围绕着大屠杀这一核心历史事件，将其影响架构在当今的美国、古老的欧洲、新兴的以色列(中东地区)等空间之上，体现出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扩展。

《夏洛克行动》讲述一个美国广告商人在以色列冒充作家菲利普·罗斯，并出席了1988年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恐怖的伊万”约翰·德米扬鲁克的审判(此人被认为在任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看守者时屠杀犹太人)。这个冒充者趁此机会在中东和欧洲各地宣扬“流散主义”(diasporism)，认为大屠杀迟早还会再发生，他计划带领犹太人从以色列撤出，重返欧洲各国定居。真正的菲利普(在此区别于作家本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本来就计划去以色列为《纽约时报书评》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作家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得知消息后，菲利普决定前往以色列去揭露和阻止冒充者皮皮克的荒唐举动，并找回他被窃取的身份。菲利普在追踪皮皮克的过程中却卷入了一场

涉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以色列情报机构、大屠杀幸存者、反犹主义运动的阴谋中。最终，菲利普答应潜入以色列情报组织代号为“夏洛克”的行动中，而他活动的细节却因为保密的原因而被删除了。

作品的情节非常复杂，从简要的情节概括中，似乎看不到大屠杀书写的内容，但是作品非常巧妙地把各个不同层次的大屠杀记忆渗透进情节叙述之中，并通过作家菲利普揭示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是如何和这些记忆模式纠缠在一起的。首先，在情节层面，作品关注的重点是菲利普和皮皮克1988年旁听的有关战犯德米扬鲁克的审判。这场当代审判唤起了之前开启大屠杀研究的最重要的首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也就是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在那次审判中，承受恐惧和屈辱的普通的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站在公开场合诉说他们所遭受的折磨，控诉纳粹大屠杀的罪恶；其次，在文本层面，包含了很多真实的内容，如罗斯为《纽约时报书评》所作的与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作家阿佩费尔德的访谈，内容就是关于小说如何展现大屠杀的讨论。此外，作品中还包含着其他有关大屠杀的文本，例如罗斯的小说《鬼作家》(小说改编了《安妮日记》)、贝娄的《贝拉罗萨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作品中贝娄直接谈到大屠杀问题，反思了美国犹太人与大屠杀幸存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在这些有关大屠杀的书写中，罗斯强调了犹太人在美国和中东以色列冲突地区的不同生存状态，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真实的大屠杀幸存者、作家阿佩费尔德与美国作家菲利普之间的对立存在，凸显了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悲剧与美国犹太人安全的生活之间的距离。罗斯在访谈录中曾说：“每一种假如的生活，都存在可能的对立的另一面。”^{[12](198)}小说中阿佩费尔德和菲利普是同龄人并且同为作家，同样写有关大屠杀有关犹太人身份的小说，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却是如此的不同与对立，“在乌克兰的森林中，孩童时候就要东躲西藏，逃避追杀，而此时我却在纽瓦克的操场上玩飞捕手的游戏，这使得他比我更了解生活的不合理”^{[13](111)}。小说中菲利普的冒名者皮皮克也很好奇阿佩费尔德与菲利普之间的关系，问到：“你为什么要和阿佩费尔德谈话……而不是我呢？”菲利普沉思了他与阿佩费尔德之间彻底分裂的历史，说道：“因为阿龙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两重性……因为我们(菲利普与假冒者皮皮克)在他人看来只是复制品，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而他(阿佩费尔德)却被认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不同的定位塑造了我们不同的生活和风格迥异的书，这是截然不同的20世纪的犹太人的传记。”^{[13](200)}

在这里阿佩费尔德和菲利普展现了 20 世纪历史中犹太人生活的对立,而大屠杀是导致对立生活的关键原因。通过这样的对比,罗斯探寻造成犹太人身份困惑的历史之谜,为何发生在古老欧洲和新兴以色列的是战争和破坏,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犹太人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和成功。

在这部作品中,罗斯对大屠杀影响的探寻已经超越了他以前作品中所设置的美国/欧洲的双重性,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问题设置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也就是美国与欧洲问题的交叉点——以色列(中东的政治)上。有评论者指出罗斯对其犹太身份自我定义时不再局限于关注纽约或东欧,而是将视野扩大到耶路撒冷、西海岸和戈兰高地^{[14](636)}。小说中特别强调了菲利普所在的空间地点的特殊性,他不是待在普通的宾馆客房中,而是“在美国的保护地,雇佣阿拉伯人的宾馆,坐落在耶路撒冷的另一端,在 1968 年前约旦和以色列的分界线上”^{[13](51)},这个地点引起了历史的共鸣,加强了故事发生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

像是五月的下午,温暖,微风,间歇的安静,即使是在 1988 年 2 月,我们距离以色列士兵仅仅有几百码的距离,就在前几天以色列士兵向一群暴动的阿拉伯男孩们投掷了催泪瓦斯。德米扬鲁克正在接受审判,他在特布林克集中营谋杀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在离我住的灌木林不远处,阿拉伯人起来反抗犹太人对占领区的管理。在柠檬树和桔子树中间,这个世界变得不再如此迷人^{[13](88-89)}。

罗斯在描写酒店周围的风景中加入了对历史的联想,其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大屠杀的发生,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大屠杀与如今发生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血腥战争产生了共鸣,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也与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交织在一起,将小说主人公菲利普特殊的美国犹太身份凸显了出来。菲利普夹杂在德米扬鲁克的审判、阿拉法特和以色列防御部队之间,背景却是代表美好、舒适生活的两棵果树,菲利普可以自由地从美国到以色列或者欧洲来旅行,并且确保自身的安全,但是在以色列、阿拉伯地区生活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却不得不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这里暗含着罗斯对大屠杀的后果和犹太复国主义危机的思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色列对于罗斯来说并不是回归,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回到上帝的“应允之地”(promised land),而是一种“朝圣之旅”(pilgrimage),在完成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美国安全的家中。这种旅行的循环本质自身就设定了身份认同的不同空间,身份认同并不仅仅局限在固定空间中,而是允许美国犹太人在保持美国身份的同时,在以色列这个犹

太人的国家中想象身份建构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反身份”(counterlife)。罗斯自己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英文单词“counter”,中文的意思是反、对立、对应的意思。罗斯的小说题名 *The Counterlife*(《反生活》)就是对该词以及所代表观念的典型运用和体现。这种反生活/反身份表达了罗斯的身份观念,罗斯在小说中就阐明了当代犹太人的身份再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能性之中的选择——是和/和/和/和/和……所有这些纷繁错综的现实存在,相互纠缠着,叠盖着,冲突着,相连着”^{[15](382)}。

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特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双重性:犹太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罗斯对自身的双重文化属性具有清晰的认识,他曾写到:“在我成长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国外,来自我们的敌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在国内,最大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或抵制我们的美国人——要么对我们以恩人自居要么严厉地排斥我们——因为我们是犹太人。”^{[16](20)}罗斯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经历了文化碰撞和社会生活的种种挑战,他无奈同时也自觉地成为双重文化境遇的跨界生存者,他不得不把自身的文化认知架设在两种异质文化之上,又不自觉地进行着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思考。同时,罗斯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非常关心当下的现实世界,尤其关注犹太文化在当今世界所面对的困境,包括与伊斯兰文化的严重对立,与美国那种“宠爱”的暧昧关系以及欧洲长期以来的排犹主义等,以色列的诞生正是犹太民族历史与现实困境的一个根本性的体现。因此罗斯将大屠杀设置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中东地区)这三个空间之上,将历史事件、民族记忆和当今政治交织在一起,他并没有简单轻易地判断正义与否,也没有提供解决的出路,而是提供了一幅了解各方的地图——美国犹太人的看法、以色列的处境、中东紧张的局势,希望能够引导人们从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空间来真正理解犹太文化的命运和特性。

罗斯是一位勇敢的写作者,在当代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够像他一样一方面受到各种赞誉,另一方面却又遭受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尤其是在对待犹太传统文化方面,批评家和读者更是猛烈地批判罗斯,认为他是犹太浪子,甚至是反犹主义者。这其实是对罗斯最大的“误读”,通过对罗斯作品的深入解读,不难发现,他的作品都或隐或现地触及到犹太书写,反映出罗斯对犹太身份探寻的历程。更重要的是罗斯没有回避犹太大屠杀这个令许多作家难以表述的沉重的话题,拓展了大屠杀书写的多种可能性,揭示了大屠

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同时，罗斯敢于挑战主流话语和读者的常规化阅读思维，突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和书写角度，发掘大屠杀美国化过程中所掩盖的犹太历史文化记忆，从而对当今犹太民族的生存方式、社会同化以及文化融合做出独特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M]. New Expanded ed, New York: Penguin, 1985.
- [2] Milowitz, Steven. *Philip Roth Considered: The 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 of the American Write* [M] r New York: Garland Press, 2000.
- [3] Ravvin, Norman. *A House of Words: Jewish Writing, Identity and Memory* [M].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傅有德. 犹太哲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5] 林斌. “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J]. 外国文学. 2009(1): 96-103
- [6] Rothberg, Michael. “Roth and the Holocaust”. In Timothy Parris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Novick, Peter.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 [8] 菲利普·罗斯. 再见, 哥伦布[M]. 俞明理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9] Langer, Lawrence. *The Holocaust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0] Budick, Emily Miller. *The Holocaust in the Jewish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C]. Eds. Michael P. Kramer and Kana Wirth-Neshe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1] 菲利普·罗斯. 遗产[M]. 彭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2] Searle, George J. ed. *Conversation with Philip Roth*. [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 [13] Roth, Philip.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14] Furman, Andrew. “A new ‘Other’ emerg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Philip Roth’s Israel Fiction.”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6.4(Winter1995): 635-636.
- [15] 菲利普·罗斯. 反生活[M]. 楚大至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6] Roth, Philip. *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in Philip Roth’s holocaust writing

SU 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Linyi Univerisity, Linyi 276005, China)

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writer, Philip Roth’ Holocaust writing reveals the Holocaust from the edge gradually into the cognitive core of the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context and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Roth’s Holocaust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atterns of Holocaust rece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locaust writing paradoxical form as well as the spatial Holocaus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oth’ Holocaust writing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Holocaust writing and shows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feat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Jewish identity.

Key Words: Philip Roth; the Jewish; Holocaust writing; paradoxical; spatial

[编辑：胡兴华]